

现代性 语境中的贫困与 反贫困

XIANDAI XING YU JING ZHONG
DE PIN KUN YU FAN PIN KUN

张帆◎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代性 语境中的贫困与 反贫困

XIANDAI XING YU JING ZHONG
DE PIN KUN YU FAN PIN KUN

张帆◎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军花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张帆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01-008036-9

I. 现… II. 张… III. 贫困-问题-研究 IV. 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474 号

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

XIANDAIXING YUJINGZHONG DE PINKUN YU FANPINKUN

张 帆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8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036-9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言

一般说来,我总是疏离于人物臧否的。对人或物的评价,在否定的一极,究其根本,无非是以一己之标准,在认定他人之谬误时而昭显自己之正确。而我总是以为自己就是一介凡人,无法依凭什么崇高的地位来定他人之正误;况且,我总觉得,面对大千世界的多样性和知识的无限性,多元理性的存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对同一现象采取不同侧面的观察点、不同的研究路径或不同的认识基点,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恩格斯在发掘黑格尔思想的革命性意义中,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扩展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并从中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从而揭示出人们获取知识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以及人类认识的相对意义:“今天已经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①正是人类知识体系的这种本质特征,米歇尔·福柯称之为“真理与谬误的游戏”;于此,也似乎可以理解尼采所说的“真理是最深的谎言”的深切含义,不过是表明了由各个时代制造的、由使真实和虚伪相对立而产生的被称为“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244页。

的东西,只不过是多次订正、被涂改的“谬误”。现在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最新的谬误。因此,学识探问的真谛,或许不在所谓的对错本身,而在于能否在问题意识的基点上为世人提供富于讨论性的观点或问题。比之于判定某种论说的正误,我更乐于听到不同的观点。毕竟,我们正是依凭于不同层面的观察、不同基点的论说,来实现对某一确定存在对象的丰富认识的,人类知识也正是以此而获得成长的。而评价人或物的肯定一极,在时风之下,往往会流于无关痛痒的“好话”。这些好话可以表现为某种规范宰制下的礼节、尊敬、甚至是敷衍的恭维……然而究其根本的动机,都无法摆脱求得某种回报的利益。而我常常会警觉生命之有限,既然有限的生命使每一个人处于有得必有失的状态,把自己的一生囿于利益基点而流于敷衍,岂不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于是,无论得失,无论好恶,我更倾向于让生命得到实实在在的体验,而渐渐丢弃了说好话的习惯。于是,为张帆君的《现代性语境中的贫困与反贫困》作序,对我成为了一桩难事;自然,要写序言的基点也就不再是评价,而是张帆君的论说于我所引发的一些感悟。

张帆君入门从学于我,我没有为师的自持,而是自觉到在我人生的体验中,增添了一份可交流的朋友情感。他基于多年基层工作的实践提出对中国扶贫方式和路径作一番探究时,我以为这一探究的起点首先是必须理清何为贫困?

早年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过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

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①这提示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②这便产生了第一个问题——贫困究竟是一个关系的存在还是一个实体的存在?

在我涉足于经济史领域时,英国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时产生的济贫法激发了我的一个猜想:尽管这些立法者可以认为他们的基点是善意的,对被扶助或救济的穷人来说应该是好事,但是,如此之好事却要依仗法律的强制手段来推行,本身就意味着穷人并不“领情”,也就是说,救济者与被救济者对“贫困”一词的涵义有着不同的理解。而后,在接触更多的民族社会资料中,我逐渐感悟到,对于以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众多的不同民族的前现代社会而言,身份要素对于社会的构建比之于其他要素或许更为重要。在这样的社会境况中,贫困一词可能更多地表达着地位、权利、道德等要素的差异,而不仅仅表达经济的或物质的匮乏。这就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贫困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什么不同的社会涵义;贫困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是否存在不同的内容表达?我极为赞赏波拉尼的一句话,当贫困的这些意义被揭示时,它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社会的被发现”^③。

尽管张帆君的论说并未沿着直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进路展开,却也提供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富于讨论性的话题。我一直以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

③ [英]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

所有研究都在两个“熟悉”的基点上展开：一是对研究对象的熟悉；一是对研究状况的熟悉。张帆君所提出的话题，突出了对后一个基点的关注。他以对贫困话语历史谱系的梳理，初步勾勒了人类贫困观的演变脉络；并且，在他竭尽所能地整理有关贫困的不同论说中，起码展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尽管当今的贫困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建构，尽管现代社会历史性地把贫困建构为一个经济性的存在，但是，当人们从能力、文化、权利乃至自由、平等、价值建构等不同的侧面来论说贫困时，已经明确地表明贫困绝非一个单一的经济性事实，而是关联到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政治权利以及不同的人或群体所接受到关系和位置的社会性配置的一个总体性存在。

在直观的表象上，贫困所对应的是富裕，但在深层结构上，二者都关联到与之不同的另一个存在——幸福——的理解与表达上。有如波拉尼所说，“实际上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①对不同的贫困话语或贫困观念的关注，提示我们在解决当今的贫困问题时，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工程，有助于我们领悟到有关贫困问题的更多参数；也有助于启发我们能够从结构性变革与生产性建设的不同进路、共同利益优先与个体利益实现等不同的基点来思考扶贫路径与方式的问题。

陈庆德己丑年春谨识于昆明龙泉居

① [英] 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4 页。

目 录

导 论	1
一 贫困问题的现实与贫困的现代性话语	1
1 苦聪人重返老林的启示	2
2 贫困话语的现代性预设	6
二 贫困现代性研究的简要回顾	9
1 国外学者关于贫困现代性的研究	10
2 国内学者有关贫困现代性的探讨	16
三 贫困作为人与人关系的表达	19
1 贫困的社会性存在	19
2 现代性贫困观的历史文化缘起	22
3 现代性贫困观的权力关系	24
4 反贫困/发展话语的现代性危机	26
四 多元视角中的贫困与反贫困	29
1 贫困研究的主体间性视角	29
2 贫困研究的后现代视野及其局限性	32
 第一章 贫困话语的历史谱系	37
第一节 以穷为恶的古典贫困观	39

一	目的论背景下的古典贫困观	40
二	需求与欲求：产生贫困的分水岭	42
三	贫困是恶的潜在根源	45
第二节	以穷为荣的中世纪贫困观	48
一	追求至圣目的的中世纪	49
二	受上帝眷顾的穷人	51
三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贫困世俗化的开启	55
四	宗教改革与贫困的祛魅	59
第二章	现代性贫困观的形成及扩展	67
第一节	作为社会自然遗存的贫困	69
一	欲望与自利的合法化	70
二	需求、匮乏与贫困之间的现代联系	73
第二节	贫困经济意义的历史性发现	77
一	贫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义	78
二	贫困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82
第三节	现代性贫困观的扩展和运用	84
一	收入贫困以及发展经济的减贫策略	85
二	能力贫困、贫困文化以及“扶贫先扶 智”式的减贫策略	88
三	文化维度的引入与权利贫困的构建	95
第三章	贫困性“他者”建构与消解	101
第一节	贫困性“他者”的建构	103
一	进步论与贫困性“他者”的构建	103
二	贫困性“他者”的意识形态化	110

第二节 “他者”的贫困真相	115
一 “高尚野蛮人”对传统认知的挑战	115
二 文化的“进化”及其限制	118
三 布须曼人的“原初丰裕社会”	125
四 廓清贫困性“他者”的现代性迷雾	130
第四章 权力遮蔽下的贫困现代性话语	137
第一节 自然主义贫困话语的权力本质	138
一 人类需要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138
二 劳动力商品化中的贫困	140
三 市场经济生成中的贫困	146
四 看清产生贫困的“自然法则”	149
第二节 “普世性”贫困话语的权力本质	152
一 分裂式发展制造贫困	152
二 文化的灭失导致贫困	162
第五章 反贫困/发展的现代性展开	169
第一节 反贫困/发展话语的知识政治	171
一 现代反贫困/发展理论的“前世今生”	171
二 两套反贫困/发展理论的话语权争夺	174
第二节 反贫困/发展现代性展开的基点	179
一 现代性的双重性	179
二 第三世界反贫困/发展话语的产生 与传布	183
第三节 反贫困/发展：从结构调整到对人的 干预	187

一	发展经济学的路径：从结构调整 到文化调适	189
二	现代化理论的路径：从消除“二元对立” 到人的重塑	198
第六章	反贫困/发展话语的现代性危机及前景..	206
第一节	反贫困/发展话语的实践困境	207
一	经济增长≠反贫困/发展	207
二	科学农业与乡土经验的冲突	211
三	日益被边缘化的“目标群体”	218
四	参与式的“装饰效应”	222
第二节	重建贫困群体的生活世界	229
一	反贫困/发展话语的解构与再结构	229
二	重建贫困群体的生活世界	235
三	探寻另类生活的可能	243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69

导 论

一、贫困问题的现实与贫困的现代性话语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起点是提出问题,而问题的真正提出是由某种理论预设,也就是语境^①的设定来实现的。尽管在直观层面上,绝大多数的学术研究都源于现实问题,但如果意识到问题的提出只能是一些具有前设性条件的理论表述,那么在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就已不再是原本的、完整意义上的现实问题了;作为人为的问题,它将被人们已经生产出来的理论和术语所表述和支配,也就是受到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实践的、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利益”预先强加的解释所支配,这是任何一个学术问题都不得不面对的知识处境。本书所涉及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也

① 语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国人类学家 B. 马林诺夫斯基在 1923 年提出来的。他区分了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际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它既包括书面语中的上下文,也包括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交流过程中某一话语结构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

是以此为基点的,这些看似十分“现实”的问题,所涉及的概念和流行的观念也都属于普通人耳熟能详的“常识”(common sense)范畴,而这些概念和观念的背后则是受到了现代性预设的规约和支配,它们只有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才能获得表达、理解和认同;一旦脱离这一语境,抛开这一预设,人们有关贫困和反贫困的诸多带有普遍性意味的“常识”就只有局部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其被某种权力所遮蔽的特殊性就显露出来了。

1. 苦聪人重返老林的启示

先从一个具体的反贫困案例来理解贫困、反贫困与现代性语境的这种内在关联。生活在云南省金平县亚热带原始森林边缘的苦聪人(拉祜族的一个支系)被称为中国最为“原始”、也最为穷困的一个族群。1998年地方政府统计,金平县苦聪人总户数1287户6306人,其中者米拉祜族乡30个自然村集中了1039户5220苦聪人,是苦聪人口最多的一个乡。同年4月,由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对者米拉祜族乡进行了为期22天的调查,结果表明,96.24%的苦聪人缺粮,大部分人依靠救济或靠木薯、猎物、野果、野菜或到河谷地区乞讨为生。苦聪人不懂养殖,文化教育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5.5%,文盲率达94.45%,30个自然村没有一个卫生室。多数人家住房是由篱笆墙、茅草和竹叶等组成,大部分家庭没有价值100元以上的物品,全家人挤在一张竹床或火塘边过夜。大部分人不会制作基本的农具,普遍缺少耕牛和化肥、籽种。^①从现代生活收入和居住指标

^① 参见云南省委、省政府金平县者米拉祜族乡贫困状况联合调查组:《关于解决金平者米拉祜族乡贫困状况的调研报告》,载《金平县调研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看,苦聪人无疑处于典型的绝对贫困、落后且愚昧的状态,这是任何一个外来的理性“经济人”都能够得出的判断。但苦聪人还有为外人所忽略的另一面:一是苦聪人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者米乡总面积 376 平方公里,而人口仅有 16964 人,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45 人,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沛,各种植物可以长年生长,山林成为苦聪人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他们不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就可以获得维持生存的食物保障。如果把苦聪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作为他们的财产的话,苦聪人显然是富有的。大自然如此丰厚的馈赠,让相当数量的苦聪人迄今为止,仍然能保持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二是长期的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让苦聪人掌握了一整套鉴别可食性植物的基本知识,并对周边动物的习性了如指掌,使他们有丰富的生存知识获取食物而不陷于饥饿。三是苦聪人为了保持迁移的灵活性,他们不建造永久性的房屋,他们所居的住房看似简陋,但他们所利用的材料很少,既廉价又方便;苦聪人死后连同房屋一同烧毁,举家迁移到别处另造新居,维持着采集狩猎生活的灵便。四是苦聪人还掌握了草药治病和控制生育的技术,使整个族群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维系着动态平衡。五是由于自然资源如此丰富且共同享有,人和人之间保持着平均主义的关系,苦聪人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某一猎户获取猎物,周围的人均无偿享用,“有肉同吃,有酒同喝”,“谁有吃谁”。苦聪人的生计方式几乎是与自然的节律高度融合的,自然的富有令任何一个健康、有一定体力的苦聪人都能单独地生存下来。^①

^① 参见晏红兴:《重返老林的启示——云南苦聪人考察报告》,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5 期。

但在充满现代化信念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眼里,苦聪人的生活简直不能算做是人的生活。从1953年开始至90年代,40多年中当地政府先后派出5批工作队,进驻苦聪人村寨,深入深山老林扶贫,虽然时代环境不同、社会制度变迁,但对苦聪人的现代化改造从未停止。当地政府先后三次将苦聪人从原始森林中搬迁出来,力图改变他们刀耕火种和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分给他们水田,教给他们农耕技术,配发农具和种子,实现定居的生活;政府的扶持力度一次比一次强,声势也一次比一次大,但扶贫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直到最近的一次(1995年)搬迁到河坝地带后,还有不少苦聪人又重回森林生活,苦聪人依旧“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必须承认山地生活方式与河坝的定居生活方式存在很多让苦聪人难以克服的矛盾:习惯于刀耕火种的苦聪人不适应水稻种植。苦聪人认为,水田耕作工序太多,累人,不如刀耕火种方便、省力;加之苦聪人疏于稻作农时的计算,常常无法按时育秧播种。苦聪人从事刀耕火种要举行仪式,但下山之后没有自己的自留地,在公共土地上不能祭祀自己的祖先。水田定耕必须保证土壤肥力,苦聪人的刀耕火种是不用施肥的,而且他们认为人的排泄物肮脏。更为重要的是,刀耕火种使苦聪人有更多时间从事采集和狩猎,一旦耕作的收获不够吃的时候,可以依靠采集、狩猎来补充,因此,苦聪人一旦遇到生活困难,就会放弃原有的水田,转入他们熟悉的森林中去,重新走向刀耕火种的迁徙之路。^①刀耕火种不但是苦聪人的一种耕作方式,也是苦聪人

^① 参见苍铭:《山民下坝的文化适应》,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制度、礼仪、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的核心载体,一旦将刀耕火种的方式除去,苦聪人的文化传统就会被连根拔起。

政府以资金、技术、项目介入的反贫困是按照普遍接受的进化论的发展范式进行的,在这种为世人熟悉的范式看来,苦聪人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极度贫困和落后的状态。发展目标应该是加快其现代化进程,苦聪人应当经历这样一个其他民族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采集—狩猎—一定耕—现代化(经济化—技术化—政治化),完成从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苦聪人似乎并不认同外来者带给他们的这种转变,当水渠出现漏水时,他们的反应是:“报告政府,你们的水渠漏水了”。输水管坏了没人修,问及为什么不修缮时,回答是,水池是解放军修的,不是他们的,应该由解放军修。乡道坏了,也没人理会,村民们认为,路是干部下乡方便用的,他们不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充满发展、进步意识的现代人在惊叹于苦聪人的“愚昧”、“冥顽”、“非理性”,甚或把责任归结于反贫困过程中主体的缺位时,^①也许未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外界为苦聪人所承诺的现代化的“美好生活”以及为达此目标所提供的路径和方法,并不完全是苦聪人的生活理想,二者基本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和话语系统中进行交流和碰撞。外来者惯于以真理在握的强者姿态强行改造苦聪人的生活世界,将他们纳入国家整体的现代化的社会改造工程之中,这种从根本上改变当地文化的反贫困行动难免会引起当地人的消极抵制,而苦聪人的生活理想似乎仍是回到老林里,“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同自然充分融合的无拘无束,除了他

① 参见沈红:《穷人主体建构与社区性制度创新》,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

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外,其他任何社会规范对他们都不起多大的作用。”^①

2. 贫困话语的现代性预设

这类的文化冲突在民族地区进行的反贫困行动中时有发生。而此类冲突通常都是在现代性的语境内被解读成贫困群体理性和科技意识的匮乏,文化的蒙昧与落后,因而需要加大扶贫尤其是提高当地人文化素质的力度;而不考虑更不必说承认在现代性的“常识”之外,还存在别样有价值生活的可能。那么,现代性给予人们认识贫困一个什么样的语境设定呢?“现代”(modernus)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世纪,意思是要把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与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当modern这一形容词的形式在16世纪末开始通用时,还是指与遥远过去相对的“最近”,但很快就获得了“新式的”、“不陈旧”、“未过时”等含义;尤其是到18世纪,它具有了标准意义,确立了一种“重新开始”的形象和意识。从此,西方人用“现代”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现代之为时刻,盖以断裂为基础。”^②它既想与刚刚过去的时代拉开距离,又不得不把超越的一切当成起点。“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③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使其自身失去了根基,“理性”由此就成为“现代”巩固自身地位的唯一依靠,

① 简小鹰等:《重返森林的启示:云南省拉祜族考察报告》,载《红河》1996年第5期。

② 瓦茨拉夫·胡宾格尔:《人类学与现代性》,载《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③ [德]于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